

多元共治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文献综述

张晓琳

(深圳大学,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垃圾围城”问题愈发严重。而国外垃圾治理起步较早,目前部分国家已形成了相对有效地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我国虽对垃圾治理工作起步较晚,但学界也不乏研究。本文在多元共治视角下,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主体展开,着重对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研究进行概述和综合。

关键词:多元主体;城市生活垃圾;垃圾分类

[DOI]10.12231/j.issn.1000-8772.2020.27.287

1 引言

随着“垃圾围城”问题的愈发严重,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垃圾资源化利用和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无法高效利用城市生活垃圾,既会给人类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也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时,学者们意识到垃圾处理是一项工程量巨大的公共服务,仅凭政府一己之力难以高效实现这项服务。因此,学界开始关注怎样通过多元主体共治有效实现垃圾分类治理。笔者通过对国内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文献的查阅,将基于治理主体的划分,从居民分类意愿行为研究、社区分类治理研究、政府政策法规研究三方面进行综述。

2 居民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研究

2.1 影响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

陈绍军(2015)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因素,发现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实现取决于认知、态度、情境等因素。陈凯、胡静(2018)则从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心理因素出发,居民的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和垃圾分类态度与垃圾分类意愿正向相关。廖茂林(2020)认为社区融合的程度会通过信任、环境责任感、垃圾分类效能感为完全中介对居民的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产生影响。

2.2 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及行为的措施

学界对以居民为主体的垃圾分类的研究,多数还从提升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及行为的措施层面进行研究。杜春林、黄涛珍(2019)认为当前我国垃圾治理中存在“激励有余,强制不足”问题,因此强制和激励必须双管齐下。通过思想教育、表扬等内在激励与政府管制、经济惩罚与法律规导等外在激励等共同作用。

3 社区为主体的垃圾分类治理模式研究

在垃圾分类治理中,重视社区的作用是有有效破解治理困境的路径。

3.1 社区垃圾治理的有效模式

“行政领导+志愿者组织+居民”的“多中心”模式效果最佳(吴双金,2016)。同时,党建引领社区垃圾分类治理也是有效途径之一。上海的党组织议事制(崔岩珠等,2020)、“党建引领+政府治理+社会组织参与+居民自治=社区善治”模式(李志青,2020)能够积极推进上海垃圾治理。此外,情感治理模式也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

3.2 提升社区垃圾治理水平的路径

重视“自下而上”的力量,下沉到社区。发挥基层力量,才能克服“运动式治理”的弊端(廖茂林,2020)。从激励转向强制应成为社区垃圾分类治理的主导逻辑,要构建“激励+强制+教育”的治理新路径。同时,还应注重舆论监督的作用,可以通过典型报道,社会舆论等,对不遵守规定进行分类的不良行为进行揭露批判,在社区内部形成舆论压力(王泗通,2019),提升社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总体效果。

4 以政府为主体的垃圾分类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担者,以政府为主体的垃圾分类治理研究也屡见不鲜。其中,学者们主要聚焦于分类政策法规方面。许多学者认为我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可操作性的、细致的政策法规,并且没有对个人、企业及政府在分类治理中的责任义务进

行明确规定(宣琳琳、马丹阳,2014)。随着2019年7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实施。北京、深圳等也纷纷加入强制分类的行列,这也充分凸显我国政府对垃圾进行分类处理的决心。此外,作者以“垃圾分类”、“垃圾治理”、“企业”、“市场”等作为关键词在CNKI进行搜索,发现以企业等市场主体相关的垃圾分类治理的专门研究寥寥无几。仅有的,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垃圾分类的研究涉及企业在垃圾分类中运营机制探讨,在垃圾焚烧及互联网+及科技背景下垃圾分类企业的原因探析等。

5 简要评述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对于城市垃圾分类治理的研究中,按主体划分又可分为对居民、社区和政府主体的研究。但纵观目前的研究,学者们较少聚焦于市场主体的垃圾分类治理研究。从研究所涉及的城市分布上看,以北京、上海、南京为主,对其他中小城市垃圾分类治理研究较少。从研究方法的选择上看,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均有涉及,但只有较少研究者能够运用比较研究、行为研究、案例研究等研究方法对分析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治理问题,我们能看到更多的则是在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的一般性经验总结。

参考文献

- [1]陈绍军,李如春,马永斌.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09):168-176.
- [2]陈凯,胡静.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城市观察,2018(4):114-122.
- [3]杜春林,黄涛珍.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J].行政论坛,2019,26(04):116-121.
- [4]崔岩珠,庞程程,史金玲,等.垃圾分类创新模式探析——以上海市程家桥三社区为例[J].党政论坛,2020(04):61-64.
- [5]廖茂林.社区融合对北京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05):118-126.
- [6]李志青,刘瀚斌,胡时霖.“垃圾分类”模式创新——以上海市的实践为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4):1-9.
- [7]王泗通.破解垃圾分类困境的社区经验及其优化[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03):121-128.
- [8]宣琳琳,马丹阳.城市生活垃圾问题与治理——以哈尔滨市为例[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87-93.
- [9]吴双金.上海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激励机制实效探索[D].华东理工大学,2016.